

# 重构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

——史华罗教授访谈录

朱秋娟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1943年生于意大利戈里齐亚市(Gorizia),1966年毕业于罗马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和系主任,现任罗马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教授。曾长期担任意大利汉学学会理事、欧洲汉学学会理事,并参与历届欧洲汉学会年,多次参加欧洲和亚洲的国际汉学会议。意大利《明清研究》期刊的创办人和主编。史华罗教授的研究从明清社会经济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转向明清思想文化史,侧重道德表现和情感文化。目前,史华罗教授主持一项名为“明清文献中的情感、心境词汇研究”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近四十年的汉学研究中,史华罗教授成果斐然,著有《孔子和儒家学派》、《中国思想史》、《传统中国里“罪”的概念》、《传统中国的激情》、《明清中国的梦》、《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等三十三部著作,并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本刊委托正在罗马大学访学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朱秋娟博士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史华罗教授,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朱秋娟 史教授,我在研究中,曾拜读过您的《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这两部著作,从而了解到您正在进行中国情感文化研究,致力于重构明清时期的情感史。这是一个很新颖也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您在《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这部书的引言部分,引用了心态史学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的名言来表达对情感研究的感受:“重新建构一个特定时代的情感生活,这一目标令人神往,同时也极其艰辛,但是别无选择,历史学家无权轻言放弃。”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您系统地

提出了情感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您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开设过短期或长期的研讨班,主讲明清时期情感文化研究。这次,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委托,想请您把自己的学术经历、经验和研究方法等介绍给大家。

史华罗 感谢《文艺研究》。《文艺研究》是著名期刊,许多名家在此做过访谈,比如启功、卞孝萱、叶嘉莹教授等等。我对受到访谈邀请感到荣幸。我也对您为访谈所做的耐心的准备工作表示感谢。对于我来说,这是个独特的学术交流机会,我可以由此直接向广大的中国学者简明地介绍我的研究。

## 一、趣向今成道——汉学研究缘起

朱秋娟 “二战”之后意大利悠久的汉学传统濒临崩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段时期,研究汉学的学者不是很多。而您正是在这段时期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兴趣,并且选择了汉学研究的学术道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您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当时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经历?

史华罗 上世纪50年代,意大利学习和研究汉学的人还不多,但是我从小就对汉学情有独钟。我从老师那里听到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后来偶尔接触到中国画,被那些极富美感的线条和色彩所吸引。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文化,希望上大学时学习汉学。不过我父母不同意,认为无法找到工作,没有前途。那时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回答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我父母觉得只有学习法律才好。于是我妥协了,到罗马大学法律系学习。我期望将来能找到外交工作,这样有机会到东亚去。学习法律的同时,我在罗马大学东方研究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个学院由约瑟夫·图斯(G. Tucci)教授建立。当时学院里学习汉语的人很少,但是学习氛围很浓厚。我获得了一些短期学习的奖学金,于是我去了香港,跟随罗梦册教授。他对哲学的研究很深,著有《孔子未王而王论》等。我们主要讨论了新儒学问题。另一个短期学习是在韩国,我跟随许兴植教授学习。他是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名誉教授。我还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部学习了三个月。大学毕业后,我在公司上班,同时也去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继续研习汉语和中国文化。1974年,我从这家薪水丰厚的大公司辞职,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从一份不稳定的合约开始了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朱秋娟 东方大学是全意大利在东方学研究方面历史最长的大学,而且在70年代,它也是规模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当时您能转行去东方大学任职,这中间的过程中您一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取得了特别令人瞩目的成果。

史华罗 我得以在东方大学任教,改变了我父母原先的看法。回忆起任职于东方大学,我特别感激东方大学的科拉迪尼(P. Corradini)教授和兰乔蒂(L. Lanciotti)教授。当时科拉迪尼教授邀请我去东方大学做过几场演讲。我做的研究是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明清时期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科拉迪尼教授的历史知识渊博,兰乔蒂教授的中国文学知识渊博,两位教授对我早期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帮助。后来,我通过了研究员的第一次考核,开始了在东方大学的教学生涯,这样,我可以专心于汉学研究了。

朱秋娟 从1974年算起,您研究汉学已近四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意大利著名的汉学家。您能否和我们谈谈做学问的体会和经验。

史华罗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汉学家,因为我的研究和兴趣非常多样,综合了社会历史、心态史、文学等等。就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兴趣非常重要。我常常惊奇和着迷于人类个性的奥秘、矛盾痛苦和愉快满足、深层内涵和表面呈现等等。为了理解人类天性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比对照不同的独立文明更好。为此,需要比较他们对紧张和压力的不同处理,比较他们对人类一些永恒的问题的不同回应和观点。

## 二、思深义亦深——研究领域的转变

朱秋娟 您最初的研究关注的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和历史,确切地说是15至18世纪这段时期。其中,我发现您对苏州这个城市很感兴趣,写了很多论文,比如《苏州织造厂:明清两朝间政府干预形成的局限与特色》、《中华帝国晚期苏州的城市社会》、《明清的苏州织造厂》等等,您最近的研究著作《山歌》也是着眼于苏州。您为何选取这段时期,对苏州又为何特别感兴趣?

史华罗 我认为这段时期是中国尚未被西方文化影响的时期,又是一个文化成熟甚至很现代的时期。苏州这个城市在当时很重要,和现在的上海差不多。我研究这座城市的社会、出版、织造局、人口迁移等等。当时政府在江南的政治力量很弱,控

制不了民间的意识形态。社会中充满各式各样的文化和与众不同的生活理念，社会阶层也很多样，民间还有很大的商业自由。我认为这是中国文明达到高水平的一个典型，就像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样。我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明末的苏州。

朱秋娟 您在明清社会经济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影响也很大。而从90年代开始，您的研究兴趣转向思想史、心态史，特别是道德和情感研究领域，转变的跨度非常大。您能否谈谈研究兴趣转变的缘起。

史华罗 其实研究兴趣的转变与我自己提出的新问题是一致的。我认为社会经济情况不只是社会经济现象，它也暗含了人们理性的和个体的态度。为了明白社会变化，应该研究观念和心态。比方说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时，我与朝鲜进行了比较。大家都知道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体系要比朝鲜开放。当时朝鲜的社会等级极其森严，个人的社会地位几乎无法改变，与中国隋唐社会差不多。朝鲜即使有科举，参加科举的人也是有等级限制的。而在当时的中国，理论上人们可以通过才能、钱财或者运气来改变等级，这并不是很难。中国妻妾子女的地位都一样，但在朝鲜嫡出和庶出的地位差别很大。朝鲜自称“小华夏”，为什么没有学习这些？难道仅仅因为朝鲜的门阀制度？这些思考促使我进一步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思想，研究社会文化。

几乎在同时，或者稍后一些，我在研究中接触了顾炎武和其他思想家，主要是实学派。对于顾炎武的思想，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很重要，他在思考为什么明朝亡于一个弱小的民族。虽然我并不同意他认为明朝亡于心学的观念，但是我仍对他的思想感兴趣。此外，我发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很明显也很重要不同，就是宗教及“罪”的概念。中国现代“宗教”这个词，与“religion”概念相关，是从日本引进的。原先的“宗教”概念，“罪”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中国，重要的是道德责任感和善、恶的概念，它们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又和情、七情、“已发”、“未发”之情等情感有关。我认为探讨情感能更深层地分析文化。于是我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

朱秋娟 情感的研究属于心态史学范畴。得益于19世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心态史学在西方蔚然成风，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不过，中国目前为止，心态史学方面的成果还不是很多。

史华罗 历史研究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目标，可以着重于事件、社会、观念、经济等等。历史学家的目标中极为有趣的是对现实表现的重建，特别是一个社会特定时期下的内在现实，这就大致涉及到心态。心态史已经是一个被认可的学科分支，尤其是在欧洲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编年史范围内做出了研究之后。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重新检查原始资料，并且准备这个方向上还没有做的资料和工具。对于心态结构，我打算建构一个特定文化里有关“思想和身体的世界”的各种认知和实践方面的复杂体系。它们反映在人们分类和评判的通常方式中：自我洞察、责任感、健康和疾病概念、信仰体系，还有价值层次，尤其是那些内在现实的意象和表述、思想和感觉状态。

朱秋娟 心理学对情感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普拉切克(R. Plutchik)划分出八种基本情感，埃克曼(P. Ekman)和弗里森(W. V. Friesen)划定了六种基本情感等等，另外还有很多分类方法。您在综合考察西方心理学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将情感分为五种类别：消极反应类型、积极反应类型、满意反应类型、攻击性反应类型、不满反应类型，分别和恐—惊、好—爱—欲、喜—乐、恶—怒、忧—悲—哀相对应。为此您几乎找遍了中国哲学和中医文献中关于情感的分类。在具体运用中，这一分类方法的效果如何？

史华罗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西方心理学中通常的情感分类方法不适用于中国文化中的情感。我所设定的这个分类方法不能说是没有局限，不过只要它的优势远多于劣势，就会在研究中继续采用它。目前看来，它很有用处，惟一的例外是爱情，因为在中国文献中爱情经常与忧伤联系在一起。在将来编成的《明清时期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中的情感与心境百科全书》中，会在更多的数据和分析基础上，总结出更精确的情感分类和情感组群。

朱秋娟 心态史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文学史是心态史的提法已为人熟知。勃兰兑斯(G.



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不过如何通过文学建构心态史却并非易事。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心态的关系,或者说文学与情感的关系?

史华罗 当我说文学作品能表达情感和心理状态时,不是说我们发现和共享与作者以及其他读者相同的感情。不管口头还是书面创作,都遵循一定的修辞和风格,这就提供了各种层面解读的可能。真实的感情不可能被发现,不仅因为它或多或少地被隐藏了——“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并不总是正确的——还因为情感语词和表达从根本上说就是模糊的。情感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读者和听者从他们的文化、环境、时代去理解片段。阅读是一种再创造,文学作品传达的信息让我们学会文化的情感代码,让我们分享情感经验。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读出作者真实的情感,我们可以找出他的情感表现、社会的行为准则、深层动机和社会价值观。比如意象,它不仅被用于一种文学研究的美学观点,而且还表示在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下被积聚的观念和影像的意思。这些观念和影像被那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也属于示意者的结构性体系,它们的内部关系网络常常被用来“绘制”其他一系列关系的结构——信仰体系的象征性表达。这样就能够解释内在和外在的现象、文化习俗、内在真实的表现形式、关于事实的心理或象征性观念等。

### 三、情有千万重——明清情感文化研究

朱秋娟 您的研究目光一直关注中国的15—18世纪时期,这一时期正好包含了明清重情思潮的完整过程。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情的高峰是魏晋时期。对您的情感研究来说,是个绝佳的时间段。

史华罗 是的,我对当时人们如何表现情感很感兴趣。因为在中华帝国晚期,人们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僵化的伦理和高压的社会,一方面是不断膨胀的私欲和个人野心。这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妥协?中国人该如何表现其私欲和公德?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朱秋娟 我知道您对此有一个观点,就是明清

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情感并不是被压抑,而是被驯化。

史华罗 在古代中国,情感和道德密不可分。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情感文化中把道德情感 and 美德视作最主要的情感,通过道德阐释改变人们的认知因素,于是心理现象被感知、理解成道德现象。所以,情感并不是被压抑,而是根据社会需要被驯化了。明清时期的情感文化中,一方面力图尝试给予个人情感更多空间,表现为肯定个人欲望的追求和满足,强调情感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对个人情感实施普遍的协调和驯化,表现为强化道德教化,在情感层面促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有强烈的激情,特别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激情,都受到忽略或者教化。明清时期情感至上的新倾向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革命的态度,也没有形成对社会和当权者的挑战。这一点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激情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时候甚至高于宗教和社会价值,尽管人们同时非常强调理性。

朱秋娟 明代中后期涌现出尊情尚性的思潮,一些思想家与文学家积极著书立说,较著名的有李梦阳的真情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等等,另外还有众多文人只言片语的观点。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提高人的自我价值,不过具体的思想也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新爱情观与这股思潮相呼应,情与理的关系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史华罗 我有两篇论文连续探讨明清时期的爱情膜拜现象,一篇是《明清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膜拜》,一篇是《对晚明时期膜拜“情”的再思考: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还是社会价值的传输者?》。明中晚期至清初,在一些文化团体中,人们建立起了对感情的膜拜,特别是对爱情的膜拜。如果把它理解成一次反抗传统的新运动,或者比照成道德家与近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这将是误入歧途。尊情和卫道之间的争论不能简化为先进和保守的辩论。这种新爱情思想的特点即是道德与情感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妥协。总体来说,情没有排斥其他的价值,也没有与社会、习俗对抗。相反,为了强调情的价值,它需要借助道德,即便对于“情”的情感化特质与伦理

的强制性特质这两者的区别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可以在冯梦龙《情史》的序以及一些篇章的尾评中,当然还可以在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看到这一点。戏曲作家汤显祖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两重性,既颂扬了超越生死的爱情,也肯定了社会规范对于个人梦想和潜意识所具有的优势。并且爱情膜拜还存在着一个将爱情理想化以及感情、欲望表达合法化,或者说道德化的过程,比如后来的《长生殿》、《儿女英雄传》。这场情的运动,是一次浪漫主义运动,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传播者。

朱秋娟 对于15—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您所著的《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一书有宏观的研究。我拜读过您的这部著作,书中对当时的爱情观念和态度,各种类型的爱情和欲望,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等等都有考察。书中您将男人之爱和女人之爱区分开来。我在研究中对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差别也深有感触。这种差别在才子佳人类型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明显。佳人对待爱情往往比才子更加主动和坚贞,并且愿意承担爱情、婚姻的风险与责任,相比之下,才子显得被动,总是逃避责任。

史华罗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我也吸收了其他学者的一些思考。一般来说,可以将男人的感情和爱与女人的感情和爱区分开来。由于两性社会分工非常严格,从而导致两性对情感的体验、反应和表达存在着差异。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爱情对于男性仅仅是许多激情中的一种,而女性在爱情中往往投入全部人格和生命。这是因为如果男性全身心地坠入爱河,便被认为是过分的爱情;而对女性来说,只要没有破坏到伦理道德规范,她们的爱便不会被认为是过分的。需要注意的是,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出现了新型的男主人公,他们被强烈的爱情所控制。在对待爱情的情感强度上,男女的差别缩小了。“帮衬”、“识趣的人”和“情种”等词汇用于描述这类具有高雅气质的男主人公。他们不分出身和职业,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还有蒲松龄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彬彬有礼,情操高尚,对女性体贴入微,充满了爱的热情和梦想,对爱情既害羞又诚挚。另外,其性格与面貌都出现了

女性化的特点。在作品中,这类人物没有受到指责,而是成为新型的英雄受到称颂。

朱秋娟 您提到的新型男主人公形象中,贾宝玉的确是一个典型。在您的情感文化研究中,《红楼梦》是一个重点考察对象。不管是中国学术界还是国际汉学界,《红楼梦》可以说是明清文学研究中永远的热点。很想听听您对《红楼梦》进行情感分析所得出的主要观点。

史华罗 在其他有关爱情的作品中,虽然有时也描写相爱者婚前的感情,但是爱情总是与实现性交往和结婚的目的直接联系在一起。《红楼梦》中的爱情与婚姻、传宗接代等社会功能的联系不十分紧密,这与它之前和之后的小说中的爱情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对照柳梦梅、杜丽娘之间的对话与宝玉、黛玉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与《金瓶梅》中的爱情倒有相同之处。当然两部小说爱情的区别也很明显,因为《红楼梦》避免展示性行为,而着意渲染感情和描绘人物内心。《红楼梦》展示了人物心理和爱情过程中的细节,诸如千变万化的感情,双方的情投意合,双方冲突时产生的相互撞击,对所爱之人情感的直觉与猜测,相爱者之间的暗示与误会等等。

对于贾宝玉这个人物,我认为应该从他的“多余”开始进行分析。他既不顾及自己的前途,也不顾及家族的未来和自己的社会责任,他是一块“多余的石头”,卧在“情根”之上,这是他的本质。他对传统婚姻表示极大的怀疑,其态度有时甚至比西方中世纪宫廷骑士文学的观念还激进。他认为女儿如水干净,男人则浊如泥,这就对成年男性世界价值体系提出了质疑。道德的污染是通过婚姻才使女性受到了腐蚀,比如嫉妒、野心、阴谋诡计等等。贾宝玉对女性美的欣赏,对女性才能的肯定,都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歧视女性的观念背道而驰。他的这些态度也必然会引起过分的激情,不过这激情并不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也不是为了婚姻的目的。这样的爱情按其自身的节奏发展,超越了传统的价值观和正统的社会规范,可能也超出了作者的本意。

朱秋娟 您的情感研究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不仅体现在研究中随处可见中西方比较的视野,还有专题论文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有两篇发表在中国

的期刊上,一篇是《冯梦龙〈情史类略〉与安德烈·勒·夏普兰〈爱情论〉:对两种不同爱情观的诠释》,您在这篇文章中比较研究了《情史》与《爱情论》,注意到两书所表达的爱情膜拜中具有宗教意涵。其后,您在《中国与欧洲“爱情”概念化的宗教影响》一文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具体分析明清爱情膜拜中宗教内涵的表现形式。从宗教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爱情膜拜,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视角。

史华罗 其实我觉察到任何比较研究都很危险,因为这是比较不同的范畴,还需要凭借普遍性。不过,比较研究对理解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非常有用。明清时期的爱情膜拜和西方的爱情膜拜遵循的原则不一样,有很大差异。论其根源,在西方爱情膜拜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因素对其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从而爱情—激情的独立价值成熟起来并且被人们接受。中国的爱情膜拜则主要遵循其他的价值观念,比如自我完善和社会功能,建立在维护亲属关系和社会平衡思想之上的家庭观念。然而明清时期爱情膜拜中具有某些宗教内涵,比如命中注定的爱情,爱情中的仪式,女性贞洁等等,这引起我的注意。不过,当我们谈到“宗教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在宗教概念上的基本区别。明清时期爱情膜拜中的仪式是表达爱情宗教性的最强烈方式。仪式内容包括珍视被认为是信物的东西,比如说肖像、诗歌、头巾。“才子佳人”小说和剧作往往凭借天定姻缘来说明女性婚前爱情越轨的合理性,个人责任被置于不可抵御的至上力量之下,这与神的超越性对于爱情的作用是相同的。女性贞洁较为复杂。从明末到清朝,赞美忠贞女子以身殉情、殉夫,并且伴随着牌坊和神龛的建立,女性贞洁成了一种宗教态度。这是爱情膜拜的一种表述,而同时又传达了传统的价值观,新旧因素纠缠交织在一起。这些宗教性表现是从佛家的“空”、道家的“变”、儒家的道德启示,还有来世报应和命中注定的普遍信仰中来。

朱秋娟 您最近有一部新著《山歌》,是对冯梦龙所编《山歌》的研究。晚明时期山歌盛行,并且在尚真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受到部分文人的关注。明人陈宏绪在《寒夜录》中引友人卓珂月的话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

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对山歌的评价极高。冯梦龙所搜集整理的山歌,主要是吴地的民歌。由于在主流文学之外,这部山歌集失传已久。1934年才由上海传经堂主人在徽州访得原书,经顾颉刚校点后排印出版。与冯梦龙的其他编著相比,《山歌》受到的关注要小很多。

史华罗 山歌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体相比显得边缘化。这个边缘性反而很有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社会背面的本相,那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江南知识分子世界。从观念学的角度来看,山歌中表达的感情具有颠覆性,因为里面的情感不符合封建伦理等级,官方立场拒绝承认这种欲望。所以,如果说山歌在中国文学框架中处于边缘位置,那么它作为表达情感代码的新途径,并且能够非常直接地将情感传递给读者,就这种效果的而言,我们不能说它处于边缘位置。

朱秋娟 您认为山歌如何表达出这种颠覆性的情感?

史华罗 山歌中的各种颠覆性成分很清晰地体现在内容和语言方面。极端的自私的激情、欲望、淫荡的想法,诚挚和背叛,都极为宽容地让它们发出声音并被接受。尽管女性是这些山歌的主角,但是很少有空间用于展示传统女性的贞洁和顺从。相反,女性的欲望、需求和希望都很简单地找到了表达的途径。其中呈现出了普遍性和人性的画面,它经常出现于头脑中,却与常识相违背。山歌提出挑战,迫使读者就两性差别和家庭对原无异议的信条作出重新评价。真的就像只能有一个天一样,她们只能有一位丈夫?男性可以有不止一个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吗?婚姻的功能就是接续香火?山歌也从社会讽刺转移到自我映射的批评,有时嘲弄某个坚定不移的个人信条,嘲笑那些持坚定的道德主义过分严厉评判他人,而不顾他人行为发生的环境背景。爱情的意象也不同于其他文献,简单地总结起来,就是爱情像食物,爱情像火,爱人像花。山歌充满一系列的象征:委婉语、隐喻、对比,特别是用于暗示性爱和欲望。谐音经常用作双关,语言上带有淫秽的玩笑。对比和象征性暗示在日常生活最普遍的经验中已经定型:生产工具如水轮、纺锤、磨坊;游戏娱乐如牌、骰子、围棋;更普遍的则如灯、



门、房间；自然界的如鱼、蚕、鸡、杨柳、花，等等。日常事物的表现之下隐含人的感情：爱的激情、仇恨、嫉妒，对谣言和社会约束的恐惧、幸福和悲伤。

朱秋娟 感谢您的介绍，非常期待这部著作有中文版问世。

#### 四、词无一字虚——情感语词分析的 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朱秋娟 据我所知，目前您正在主持一项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名称是“明清文献中的情感、心境词汇研究”，系统研究15—18世纪中国的情感历史。这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如此系统地研究中国情感文化。

史华罗 1996年开始，我们有了第一次国际合作，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中文系合作。中国人民大学方面是由章安祺教授负责，接下来是杨慧林教授。不过在此之前，对这一课题我已准备了十年。我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文学和非文学文本材料的工作小组，收集、研究散集在明清两代众多文献中有关情感和心态的描述，重点是词汇。目的在于重新建构15—18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精神表现的史实。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与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各学科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在这时期，工作小组共有十五位成员，除了意大利的汉学家，还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学者。目前已完成词汇收集，集中于分析研究工作。最终研究成果将是多卷本的《明清文学和非文学材料中的情感和心境百科全书》。

朱秋娟 您为该项目建立了一个语料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如何判定收录标准，具体如何操作？

史华罗 在数据库中，情感及其整个范畴、精神状态、身体知觉这些语词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它的目的，正如已作出的解释，不是仅仅从语言学出发做一部情感语词的词典，而是还要收集情感的表现形式、情感的评价和看法、形象化的描述，最终是重构内外现实的心理表现碎片。所以不仅包括直接表述情感的词汇，比如高兴、悲伤等，也包括许多这样的词汇：它们不直接涉及情感，但是以各种方式隐含着情感，如“忠实”、“徘徊”、

“苍白”等。实际上只有一类词语纯粹用于表达心理状态，其他绝大多数都需要依据文本确定其是否为情感语词，因为有些词语同时还是非情感语词，比如“要”、“急”。每一个情感词语之后，还有其他条目，诸如英文对应词，中文原始文本的段落及其翻译，关于认知和象征内涵、修辞形式的注释，先前的情景和动机，身体动作的行为、反应和陈规，语法类型、语音长度、语形结构、语用，文献出处。这个数据库可以检索，每个词条的界面会呈现这些信息。目前已经收录了数百个情感、心境语词。

朱秋娟 您从情感语词的精密分析入手，去揭示隐藏其中的文化深层结构，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曾论述：“过去我们将汉语语词机械地译成英文，无意间便抹杀了文化差异，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差异作为分析的起点。”您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个设想。

史华罗 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乍看之下，有许多相似的概念，比如友谊、家庭的维系、不受干扰的权利、自我学习和成长、反省、社会的制约等等，然而，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它们是基于对于个人和隐私的不同观念上的。这些困难倒是与历史学家们在处理不同文化的文本及其相似维度时的尴尬颇为相似。我们要么只相信自己的智力判断，要么到处去寻找差异。

朱秋娟 在《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这部著作中，您阐明了项目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初步展现了明清情感史的轮廓。对于情感研究来说，理论和方法极其重要。情感研究并非易事，由于作品中的情感复杂、微妙而捉摸不定，总是与读者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研究者分析它时，可能会由于带有主观色彩而陷入困境。这也是叙述界较少有人研究情感的部分原因，就是研究结果容易受到质疑。从这个方面来说，理论与方法对于情感研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我认为情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正是您这部著作的意义所在。

史华罗 我同意。不但作品中的情感复杂、微妙而捉摸不定，情感自身也是模糊和复杂的。同一种情感会因情况不同和主观看法而改变。情感理论的不同取决于强调上述因素的其中一方。这就是为

什么有些理论强调情感和身体的关系,包括肉体 and 神经生理的反应;有的理论强调知觉基础上的天性;有的理论强调构成中社会文化的内容。情感术语很复杂,任何综合分类法都无法将之归入一个连贯的分类系统。情感的确切定义成为众多辩论的根源,由于词语总是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符号,并且依据不同的环境、文本和个体经验有不同的解释。同时,这又对文本的分析提供了文化深层结构的宝贵信息。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我假定了这样的理论前提。情感是一种可传达一系列情感代码,并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语言”,同时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中互惠状态的重新协商。作为一种语言,它的外部表现和迹象可以是分析和评价的对象,并且可以对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理解提供基础。它被建构在由它们的文化环境提供的象征性的、理性的和种族性的因素上,它通过一种语言——一种在认知水平上相对连贯的概念组织来显示。这样,通过研究感情和象征,可以研究一个社会及其文化产品的内在结构。

朱秋娟 您通过情感语词分析的途径去建构情感、心态的史实,并进而探析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分析过程中,非常灵活地运用了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明清社会生活的镜子》、《前现代中国的表述中“笑”的功能——一个初步考察》等论文很能代表您的研究方法。您在诸多文献中收集了大量语例,将相关语词最大限度收集完备,在对话词分类、诠释的基础上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非常令人信服。

史华罗 明清时期的情感语词与表达非常丰富。在众多文学作品和《明史》、《明实录》中,我整理出的关于记忆的情感语词超过一百个。关于“笑”的情感语词更多。我从《红楼梦》、《陶庵梦忆》、《山歌》、《牡丹亭》、《警世通言》、《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金瓶梅》、《子不语》、《浮生六记》,以及一些历史文献,还有吕坤的著作中收集关于笑的词汇,总结出三百种关于笑的表达方式。仅在《红楼梦》中,“笑”与其他词结合在一起使用有4100次,作为单独的词使用有3200次。

朱秋娟 《前现代中国的表述中“笑”的功

能——一个初步考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您对此有什么发现?

史华罗 这些文献中的“笑”可以分为四类:高兴愉悦的笑,轻蔑嘲讽的笑,友好迎合的笑,丧气尴尬的笑。这四种基本分类展示了笑如何反射和反应社会信息。绝大多数例子里,它内在的意味取决于文本而不是这些特定的词语。描述也并不总是很详细,但有许多象征性典型的表达形式以及隐喻、成语丰富了表达。总体来说,笑是最常见的情感,除了高兴之外,就是爱(包括友好和戏谑)和害羞、尴尬,随后是钦佩、尊重、满足、骄傲、鄙视、赞许、惊奇、爱的激情、明白、生气和感激。社会和文化不同影响“笑”的表达,使之具有差异。这个差异不仅很明显地体现在习语和象征性表达上,还体现在这些习语和象征所出现的特定语例。我现在编辑了一部论文集,即将出版,收集了多位学者的相关论文,作者包括汉学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者。

朱秋娟 心理学方法一直灵活地运用在您的研究中。我了解到您最近还有一本新著出版,名为《中华帝国晚期人格剖析的材料》,是关于明清时期的人格研究。这部著作很明显侧重于心理学研究方法。

史华罗 这本书有关于明清时期人的心理表现。个人对部分或全部形象的苦心经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价值阶梯自我坚持,另一个是对被描述主体的情感态度。后者是众多因素的结果,比如移情作用和态度,或者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的论述中,自我是由“气”构成,依据阴和阳而持续的转化,不仅与自然现象有关,还与个体生命和性格有关。在此基础上,主体看到其存在论上的道德天性,也看到他具体的和矛盾的个人性格,从注定的体质、寿命、性情、外表到道德态度、恶习、美德、弱点、强项。另外,在一个人的自我感知中,性别意识、家庭背景、宗族或其他联系、地区归属、方言、朋友范围、社会角色也很重要。鉴定对话者或意识属于哪一类别,比如文人、商人、僧侣、武人、女人,这对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具有功能性。所以,这部书中在外表、社团联系、人格特征及随后的行为等方面,都安排了各类信息。



朱秋娟 您这部著作尚未有中译本,能否对研究成果做些介绍?

史华罗 这部书主要是在文本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人格片段的重要样本,考察了常见的个性类别。有对内在价值积极的描述,比如聪明、谨慎、才气,相反的则是愚蠢,另外还有糊涂—明白,有心计儿的一呆头呆脑,夺天工—粥粥无能,聪敏—傻心肠儿等这些成对的词。慷慨经常和其他秉性结合,如慷慨刚毅、慷慨好客、任侠、喜宾客。谦虚和诚实相结合,如谦恭厚道。其他的人物个性有野心—谦逊、恐惧—英勇、固执和自负等。从道德观点看,善与恶,忠诚、诚挚及其反面,诚实及其反面都被挑选出来。这些个性最终直接与社会相关,挑衅、利己和积极的倾向都得以呈现。人格中病态反常的方面体现出两种消极和对抗性的个性。一种是精神能力不足,比如反应迟钝。另一个类别是与社会性冲突的品性,包括四贪基础上的主要恶习。对于主要的恶习,道德声调占主导。关于性情的讨论常被置换成伦理暗示,特别是在抽象地考虑美德和恶习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社会以集体主义为特征,人们在社会团体中相互依赖,集体的目标具有优先权,以集体的标准规范主要行为,以公共的方式表现。他们顺从权力和传统,以人际的秩序、和睦为先。然而,竞争程度也很高,至少在知识分子和商人阶层是如此,成就动机具有社会性目的。

## 五、鹊桥今架成——关于汉学研究的交流

朱秋娟 兰乔蒂教授曾说:“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最早的汉学研究可以上溯到利玛窦和魏匡国,并且在1732年,马国贤神父于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人学院,这是意大利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大学首次开设中文讲座课程,始于19世纪末。而汉学真正得到大力推广,要到20世纪80年代。目前有不少大学设立专门的学院教授和研究汉学与东方学,还有多个汉学研究机构,意大利汉学发展的步伐很快。

史华罗 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汉学研究者,研究领域很多,除了文学,还有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哲学、考古与

艺术史、科学史以及传教士史等等。期刊方面也有近十种重要的汉学研究和东方研究期刊。另外大部分重点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对汉学感兴趣,这在意大利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另一方面学汉学有机会找到工作,我们有许多教授中文的职位。不过,现在只有罗马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威尼斯大学、杜林大学和其他少数大学,同时教授汉语、文学、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等。很多学校只教汉语,其他方面顶多只有几个小时的中国文化介绍,就像教授英语和法语一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很相似,学生只要学习语言就足够了,但是中国文化和我们差异极大,他们只学习语言是不够的。虽然学生有短期学习奖学金,可以去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好,无法深入了解中国。这是还需要发展的地方。

朱秋娟 其实在意大利汉学研究的传统中,一直都同时注重研究和教学。对于只学语言而缺少对文化的了解,由此造成的不足,我也深有体会。来意大利这段时间,觉得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太少,只学过英语语言远远不够。您刚才提到汉学研究的期刊,据我了解,您是《明清研究》的创始人和主编,能否对该期刊作些介绍?

史华罗 这本刊物创始于1992年,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资助。2007年,我工作调往罗马大学,期刊就由罗马大学和东方大学共同资助。第一期是以意大利语出版,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从第二期开始改为英语,一直至今。每年出版一期,用于高校学术交流,不对外公开发行。期刊的研究主旨是对14、15世纪到20世纪中国和东亚汉文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深层研究。所收录的论文涉及到各个学科,比如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符号学、政治学、哲学等。期刊为各领域的学者提供沟通东方学和西学的桥梁。对于年轻学者、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文章,我们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朱秋娟 您在汉学方面有多部编著、译著,以意大利语出版,在意大利推广了汉学。您单独编写了《中国思想史》和《孔子和儒家学派》,译注《论语》,与沙巴提尼(Sabattini)教授共同编撰《中国通

史》。在纯文学方面,您翻译了《猴子的梦》(《西游补》),编选翻译了《明朝至20世纪末的中国小说》的古代小说部分。其中的《西游补》是一部很重要的续书,对于您来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翻译这部小说。《明朝至20世纪末的中国小说》中,您选择了哪些小说?

史华罗 《西游补》是本很有趣的书,但还没有意大利语的译本。美国有这部书的英译本,这个英译本对我的翻译工作很有帮助。这部书反映了心的流动。心的一个象征是悟空,他走来走去,一直在迷失;另一个象征是镜子,它幻化过去、未来,令悟空迷失。某种程度上,它是哲学故事,探讨如何去控制心。《明朝至20世纪末的中国小说》所选小说大部分此前还没有被翻译为意大利语,明清部分,有的选自短篇小说集,如“三言”、《剪灯新话》、《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有的节选自长篇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现代部分的小说是由我的朋友沙巴提尼教授编选翻译,他选择的作家有郁达夫、老舍、蒋子龙、白先勇等。

朱秋娟 您除了参加历年欧洲汉学年会和众多欧洲、亚洲的汉学会议之外,从2000年开始,您在意大利已主持了十余次学术会议和研讨班,参与者有欧洲、美国、亚洲的学者。这很能反映意大利汉学的学术风气浓厚。

史华罗 从2000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都在5月,我们称之为“春天会议”。会议规模十几人到三四十人不等。意大利的汉学家之外,也邀请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参加会议,如顾彬、马克梦、古柏、柯丽德等等。会议主题都是围绕情感研究,研究范围则扩大到亚洲。历次的主题有《重建情感片段:明清心态表现的文本研究》、《笑背后的情感:从面部表情到文学描写》、《东亚哪些非情感术语能揭示情感》、《东亚情感的概念和分类》、《东亚文学和非文学文献中情感和性情的表现》、《东南亚文化中肢体感觉和情感的观念》、《亚洲文明中的性爱和情感》、

《亚洲的情感表现:奇异和类似》、《东南亚情感原型示例》、《亚洲实录性和文学性资料中对心态的表达》、《中国情感与史料分析》。每次会议都很有收获,许多论文令人深思。比如关于“笑”的那次会议,有的论文研究某文体中的笑,如小品文;有的研究某作品中的笑,如《镜花缘》、《儒林外史》;有的研究某种类型的笑,如尴尬的笑、意外的笑、自吹的笑等等,还有社会角度的研究,如明清文学中笑的阴暗面、笑所具有的社会性符号。

朱秋娟 您曾长时期以来担任意大利汉学理事、欧洲汉学理事,对汉学研究有很多宏观的、前瞻性的思考。前年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上的发言,体现了您对汉学研究的最新思考。

史华罗 那是一次很大的盛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得非常好。在过去的多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组织过很多重要的国际大会,展示了对当代历史变迁的了不起的理解力。前年那次会议的讨论主题是“汉学作为文化交流的平台”。对于汉学这个概念,其实一直处于讨论中,没有明晰的界定。我认为它是一个学科复合体,围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实体展开研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汉学不仅意味着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意味着在与另一个文明的对比中,批判性地反思自身的文化和经验,反思自我身份认同。比如我们很容易看到中国学者、西方汉学家和日、韩汉学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文化实践”、自我认同角度是不同的。21世纪的汉学与20世纪也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信息化等等都影响我们的认知和思考。现今的汉学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跨文化方法上的中国研究。

朱秋娟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令我获益良多。

责任编辑 山木